

考古发现最早的“太极纹”： 原始“阴阳”观念的形象表达

黄 亚 平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在江汉平原地区众多属于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数量不菲的陶纺轮,其中的彩绘陶纺轮占比较高且饰有丰富的彩绘纹,如条带纹、四分直线纹、麻点纹、弧线旋纹、扇面纹、风车纹、同心圆纹和“太极纹”等,尤以“太极纹”最具特色。石家河遗址群集中发现的“太极纹”应是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史前太极纹饰,这一纹饰是石家河先民原始“阴阳”观念的形象化表现形式。对“太极纹”的深入考察和探究,对我们弄清原始“阴阳”观念的最初状态和形成过程,探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文化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石家河遗址群;太极纹;疑似鸟纹和鸟崇拜现象;原始“阴阳”观念

中图分类号:K87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4-0026-08

考古发现的“太极纹”出现在屈家岭文化晚期,盛行于石家河文化早期阶段,且仅出现在彩绘陶纺轮上^①。其构图要素如下:其一,利用陶纺轮之上的中心圆孔构图,中心圆孔可能被赋予象征意义;其二,具备太极图构成之双条带纹或“阴阳鱼”纹;其三,双条带纹均围绕中心圆孔顺时针方向或逆时针方向旋转。以上三方面的构图要素基本上被历史时代流行的太极图所遵从和沿用。正因为如此,石家河文化早期集中出现的“太极纹”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体现了江汉平原中游地区本土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其中很可能孕育着原始的“阴阳”观念和原始道文化的因素。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考古发现的“太极纹”与流行的八卦太极图并不完全相同。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周易参同契》《周易本义》《易经来注》等典籍所载太极图皆按方位配置伏羲先天八卦,其阴鱼旋转方向为逆时针方向,表现了“负阴抱阳”的观念。考古发现的阴阳鱼充满画面的典型“太极纹”仅见两例(见图 1 a4 和 b4),但阴阳鱼的旋转

方向并不固定在逆时针方向,其阴阳鱼位置也不尽相同。最重要的一点,考古发现的“太极纹”并无八卦相配,而历史上流传的太极图通常都与八卦相配。其二,历史上流传的八卦太极图阴阳鱼头部各有一个“鱼眼”,分别代表日、月;考古发现的太极纹则没有“鱼眼”或只有一个“鱼眼”,但却有象征太阳的中心圆孔。其三,据说八卦太极图重新出现在宋代,其太极图案与八卦相配,形态已经固定。但民间流传的另外一些八卦太极图则形态和旋转方向有别,而与考古发现的太极纹的情况类似,或许民间相传八卦太极图亦自有其渊源,并非全是空穴来风。

我们收集和重新梳理了目前已公开发表的石家河遗址群各考古报告中列出的“太极纹”,去掉其中重复的标本纹样,将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早期考古发现的彩绘陶纺轮上的“太极纹”重新区分为 A、B、C、D、E 五型及 I、II、III、IV 四式,如图 1 所示。

收稿日期:2020-04-21

基金项目: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艺术·考古与文字起源:前文字研究”(18FYY016)

作者简介:黄亚平(1958—),男,甘肃天水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①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 年第 3 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 版;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 1987 年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90 年第 8 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 年第 2 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编著《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 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 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 年。

I

II

III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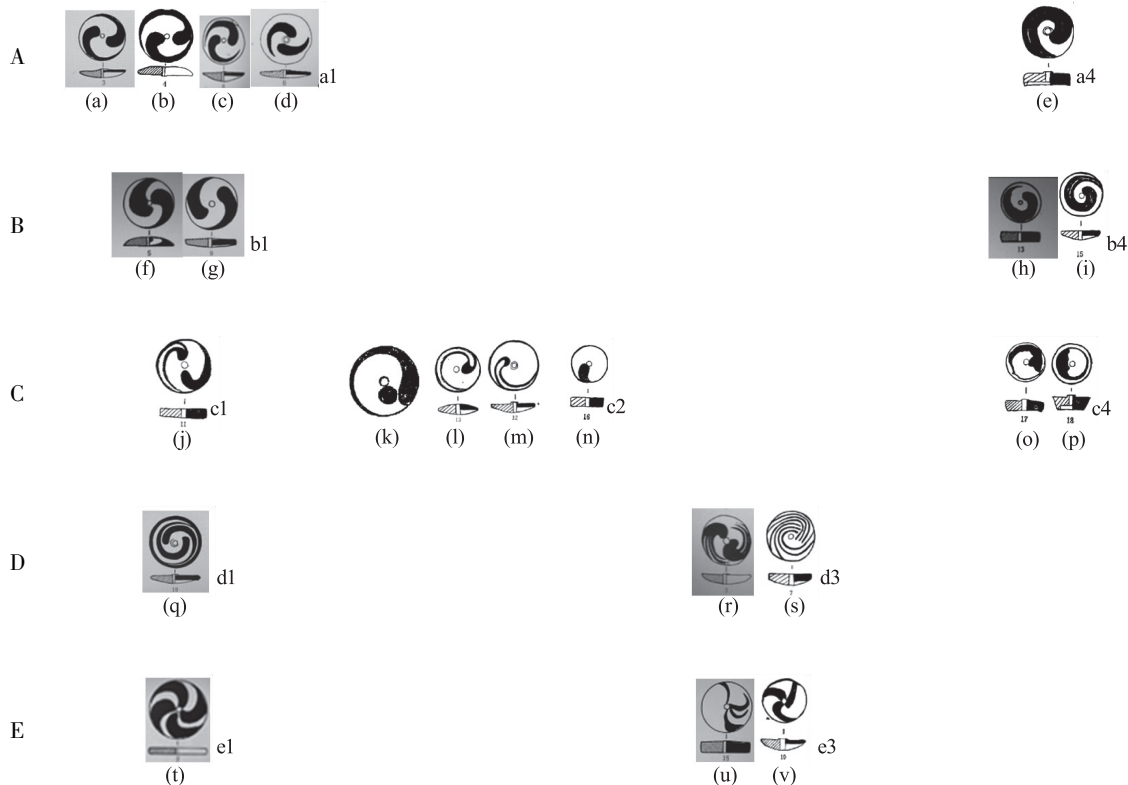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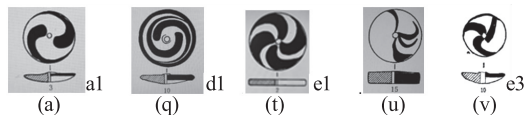


图1 考古发现的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太极纹”

图1中所列“太极纹”属于屈家岭文化者共4例,分别为a1标本(AT307⑤:9),d1标本(T4⑥:3),e1标本(T31④:12)和e3标本(AT307⑥:23)。其中,d1式标本(T4⑥:3)为红彩绘制的旋转的弧形条形,周边一圈红彩边线绘制很粗,中间小孔周围还有一表示旋转的朝上开口的半圆,从构图形态上看,当命名为“旋纹”为妥。e1式标本(T31④:12)亦为红彩绘制,形状颇近似后世的风车纹,与太极纹迥然有别,当命名为“风车纹”才比较准确。e3式标本(AT307⑥:23),其构图与e1式标本(T31④:12)基本相同,只是残缺半边。图2所列“太极纹”实际上只能算是“旋纹”,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围绕中心圆孔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运动,其彩绘条带纹有二旋、四旋两种,参照石家河文化条带纹,如标本(T30③A:11)以及图3所列屈家岭文化旋纹的情况,我们估计在该文化遗址中将来还有可能出土更多的旋转条带纹。

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纺轮上的纹样主要也是旋纹和风车纹,其具体样式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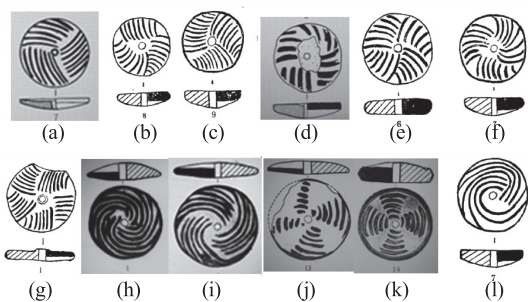
丰富,不仅有内旋、外旋,还有各种切分成不同等分的旋转弧线,从三旋至五旋都有。如图3所示。估计将来同样有可能新发现更加丰富的屈家岭文化旋转条带纹。



(a) 邓家湾:AT307⑤:9,屈家岭文化,黑彩;(q) 邓家湾:T4⑥:3,屈家岭文化,红彩;(t) 邓家湾:T31④:12,屈家岭文化,红彩;(u) 邓家湾:AT307⑥:23,屈家岭文化,红彩;(v) 罗家柏岭:T30③A:11

图2 屈家岭文化晚期“太极纹(旋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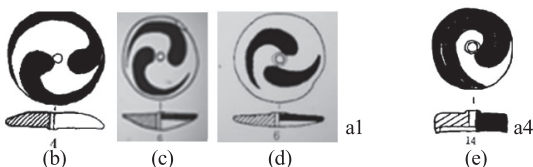
众多的旋纹、风车纹与仅有1例“太极纹”的情况表明,在屈家岭文化晚期,该文化对旋转概念的艺术表现比较发达,具体表现为其彩绘纹饰从三分至五分,从左旋到右旋都应有皆有。因此,屈家岭文化彩绘陶纺轮上所谓的“太极纹”很可能仅与表现旋转概念有关,其与石家河文化早期成熟的“太极纹”表示原始的“阴阳”观念尚有一定的区别。



(a) 邓家湾: T27④:38; (b) 罗家柏岭: T11⑤:2; (c) 罗家柏岭: T14⑥:9; (d) 邓家湾: AT409⑤:8; (e) 罗家柏岭: T11⑤:17; (f) 罗家柏岭: T1④D:5; (g) 罗家柏岭: T14⑥:9; (h) 京山屈家岭: T83:4(1); (i) 京山屈家岭: T97:4(3); (j) 京山屈家岭: T96:3C(1); (k) 京山屈家岭: T98:4A(3); (l) 罗家柏岭: T7⑤:13, 石家河文化

图3 屈家岭文化彩绘陶纺轮上各式各样的旋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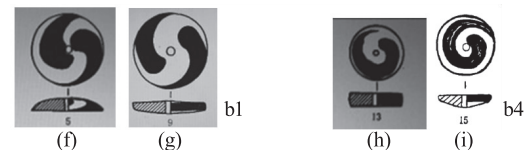
石家河遗址群考古发现比较成熟的“太极纹”标本大部分属于石家河文化早期。图4所列A型均为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太极纹”,但各式构形也有差异。a1式3个标本延续了屈家岭文化标本(A7307⑤:4)的艺术表现风格,皆为逆时针方向的两条彩带纹围绕中心小圆孔旋转的图案,两条彩带纹之间尚有较大留白,其间区别主要在于两条彩带延伸和留白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标本(AT2006②:5)比其他2例尾巴更短。a4式用彩色画出一条彩带,另一条彩带则利用底色表示出来,形成一幅充满整幅画面的太极图案,为石家河文化早期太极纹典型图例。



(b) 邓家湾: A7307⑤:4; (c) 邓家湾: AT104⑥:16; (d) 肖家屋脊: AT2006②:5; (e) 罗家柏岭: T30③A:16

图4 石家河文化早期A型“太极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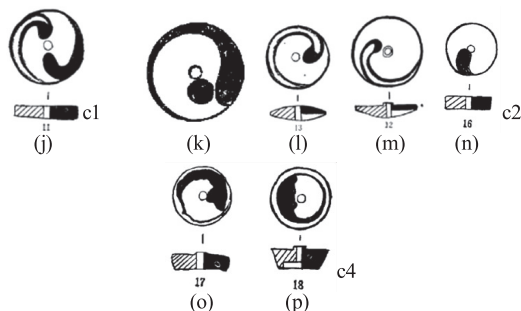
图5所列B形皆为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太极纹”。其中b1形为顺时针方向围绕中心小圆孔旋转的两条彩带纹,两条彩带纹之间同样有较大留白。b4同样利用白底与黑彩构成对称旋转的图案,同样充满整幅画面,相对而言,标本(AT104⑥:5)则更为典型。



(f) 邓家湾: AT201②:3; (g) 邓家湾: AT9③:36; (h) 邓家湾: AT104⑥:5; (i) 罗家柏岭: T30③A:17

图5 石家河文化早期B型“太极纹”

图6所列C型皆为疑似鸟纹的条带纹或发育不全的太极图案。C1式两条彩带中的一条仅用黑彩画出头部,其余部分不着彩,疑似鸟纹的痕迹。C2式仅彩绘两条彩带中的一条,甚至只在一条中的头部绘以黑彩,其余部分皆留白,并无彩绘。其中的标本(邓家湾:1956^①)在陶纺轮中心小圆孔旁另外用黑彩绘出一小圆点,并以此逆时针方向彩绘一条带旋纹,条带纹的尾部几乎与头部相接。如果说C1仅彩绘头部一点的条带纹疑似鸟纹,那么,C2式从整体上看几乎都显露出鸟的形象。尤其是标本(邓家湾:1956)和标本(T20④:2),两者都与庙底沟太阳鸟纹疑似。标本(T30③A:14)和(T13④:34)彩绘了条带纹的头部,标本(T20④:2)单条彩带纹饰仅彩绘了区部,其余部分皆留白。C4式两件标本黑彩条带纹同样仅绘制了一条黑彩条带纹,其余大部分面积留白。(见图6)



(j) 罗家柏岭: T30③A:13; (k) 邓家湾: 1956; (l) 罗家柏岭: T30③A:14; (m) 罗家柏岭: T13④:34; (n) 罗家柏岭: T20④:2; (o) 罗家柏岭: T30③A:19; (p) 罗家柏岭: T30③A:18

图6 石家河文化早期C型“太极纹”

图7所列D型“太极纹”实际上包括条带纹、疑似鸟纹的尾部分岔的旋纹和三条曲线环绕的旋纹,其上承屈家岭文化旋纹而来,表现的是围绕中心旋转飞翔的观念。d1标本(T4⑥:3)为两条头部相向环绕的条带纹;d3标本(AT104⑥:17)似为两只头部相向,尾部分岔旋转飞翔的鸟纹,这一标志性的纹饰图案是我们解开石家河遗址群太极纹饰或图案真正涵义的关键所在。此类纹饰图案在中国东部、南部和东南部的鸟崇拜现象中并不少见,标本(d3 T7⑤:13)应为抽象的鸟纹或鸟纹和简化形式,同样应予以重视。

^①此处材料来自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12期,该《简报》并未有正式的发掘编号,本文编以“邓家湾:1956”字样,特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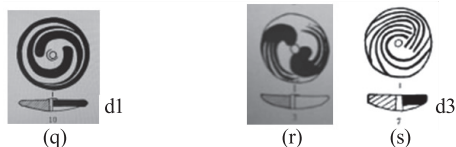


图7 石家河文化早期D型“太极纹”(旋纹)
(q) 邓家湾:T4⑥:3;(r) 邓家湾:AT104⑦:17;(s) 罗家柏岭 T7⑤:13

图8所列E型为旋转的风车纹图案。标本e1(T31④:12)为典型的风车纹,用黑彩绘出四条围绕中心圆孔逆时针方向旋转的纹饰;e3中的标本(AT307⑥:23)应是残缺的风车纹;标本(T30③A:11)似应看成三条围绕中心圆孔旋转的风车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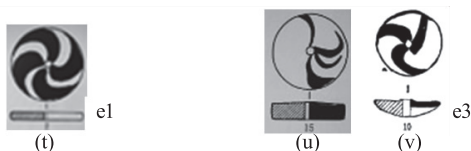


图8 屈家岭文化晚期D型“太极纹”(风车纹)
(t) 邓家湾:T31④:12;(u) 邓家湾:AT307⑥:23;(v) 罗家柏岭:T30③A:11

在图1所收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全部A、B、C、D、E五型太极纹中,实际上,只有A、B两型名实相符,其形状与我们熟知的太极图比较接近。其中属于屈家岭文化的4例并非真正的“太极纹”,而更有可能是旋纹。属于石家河文化早期类型的D、E两型则明显是“条带纹”和“风车纹”,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太极纹”。至于C型,由于纹饰的残缺,可以看成“疑似鸟纹”或发育不全的太极纹或者太极纹的过渡型。因此,在图1所列的全部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早期太极纹中,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性“太极纹”只有标本a4和b4,而这两个标本都表现为围绕中心圆孔旋转、条带纹图形填满画面的情况,其间的区别只是旋转方向不同而已(图9),其余的标本则只能算是“太极纹”之前的类似纹饰或图案,似亦可看成是史前太极纹的异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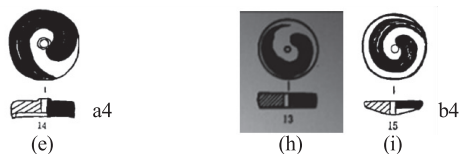


图9 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典型“太极纹”
(e) 罗家柏岭:T30③A:16;(h) 邓家湾:AT104⑦:5;
(i) 罗家柏岭:T30③A:17

为什么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先民们选择在彩陶纺轮上彩绘“旋纹”“风车纹”“太极纹”

一类的纹饰,这些纹饰有什么样的涵义?此类纹饰有没有更早的史前渊源?本文尝试做出初步的回答。

石家河遗址群发现的彩绘陶器集中出现在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这一阶段,至石家河文化晚期,已经基本不见彩绘陶的踪迹。而经科学发掘的彩绘陶纺轮集中出土于邓家湾、罗家柏岭、肖家屋脊等几个地点,据说“枯柏树后的台地上曾采集到过大量彩陶纺轮,当地人俗称‘土钱’”^[1]。但未见公开发表。而石家河遗址群出土的彩绘陶纺轮跟本地该文化另外几个代表性文化遗物,如红陶杯、陶偶和陶塑小动物一样,都“分别出土且大量集中地出自不同的遗址”。

彩绘陶纺轮是石家河文化典型器物之一,可区分为素面和彩绘两种形式。考古发现的陶纺轮数量众多,据我们的统计,仅邓家湾、肖家屋脊、罗家柏岭三地出土的陶纺轮多达1265件,其中彩绘陶纺轮的数量总体上还要多于素面陶纺轮。

石家河遗址群的彩绘陶纺轮多见于考古发掘的探方,如邓家湾A区探方、罗家柏岭探方之内,有一部分出土于石家河先民废弃之前储存物品的灰坑之中。其中还有一部分彩绘陶纺轮与陶偶和陶制动物伴随出土,这些伴随陶偶和陶制小动物出土的彩绘陶纺轮及其上绘制的“旋纹”“风车纹”“太极纹”图案很可能带有宗教意味,表现了一定的原始巫术-宗教观念。我们以为,陶纺轮上丰富多样的彩绘旋纹表现了石家河先民所能体认的回环旋转运动。彩绘陶纺轮中间的小圆孔,本来为陶纺轮自身所带,具有实用功能,使用时在孔中插入细木棍,就可以旋转纺线。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素面陶纺轮属于生产工具,至于彩绘陶纺轮,则可能被用作表达太阳鸟旋转纷飞的纪念性的礼器来使用,与红陶杯、陶偶和陶塑小动物一类的原始礼器用于祭祀活动之中^①。屈家岭和石家河先民选择在陶纺轮而不是其他器物表面彩绘太极纹,很可能是把日常生活中陶纺轮的旋转纺织活动与旋纹、太极纹围绕中心圆孔的旋转顺势黏结在一起,以此来表现盛行其地的太阳鸟神话观念。众所周知,在原始的巫术-宗教语境中,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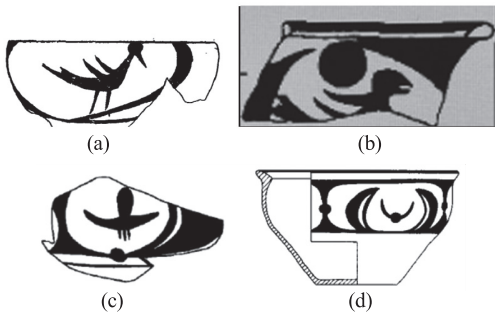
①蔡清泉认为:“彩绘纺轮在旋转时会因不同图案而产生种种美感,可消除长时间纺纱劳作者的枯燥感和疲劳感,是适应史前纺织业大发展的产物。”此说似未尽然。详见蔡清泉《江汉地区三苗酋邦的昌兴——屈家岭文化遗存的历史学考察》,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万物皆有灵性,精灵和灵魂可以在人与物之间,在物与物之间穿梭并自由转换^[2]。据考古发掘报告,石家河文化原始宗教氛围非常浓厚,原始巫术-宗教祭拜仪式盛行,在此一大背景之下,彩绘陶纺轮中心的小圆孔有可能隐喻太阳,太极纹则很有可能象征太阳神鸟的翻转飞翔,两者结合起来,则非常形象直观地展现出石家河先民对太阳运行和神鸟飞翔关系的情感体认和心理体验。

综合考察和比对考古发现的不同型与式的彩绘陶纺轮纹饰可知,石家河太极纹纹饰的祖型很有能来自于时代更早的鸟纹,且与相邻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江南地区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盛行的鸟崇拜观念相互联系。石家河遗址群出土的太极纹图案有可能是对来自中国中东部、西部、东部和东南部史前文化中盛行的阳鸟崇拜观念的抽象化表达,表现的是简化或抽象化了的两头相向,回环翻飞的飞鸟形象。

太阳和飞鸟共生的现象,普遍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中东部、东部和东南地区,且在这个地区流行的上古神话传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3-4]

图 10 所列庙底沟类型的侧面鸟纹和正面鸟纹,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太阳鸟与太阳及太阳运行轨迹的关系^①。华县柳子镇标本表现了太阳鸟和它飞翔轨迹,标本(H165:402)表现了背负太阳的金乌形象;标本(H322)则表现的是正面飞翔的日中金乌,她背负太阳,展开双翼翱翔于空中,周边的弧线纹和弧线上的太阳圆点纹与侧面鸟纹中的弧线纹一样强调太阳的运行轨迹,标本(H9:47)与之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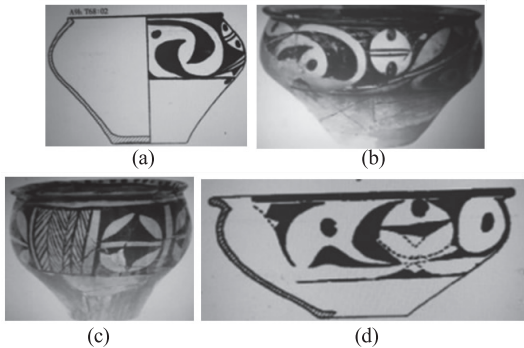
(a) 华县柳子镇; (b) 泉护村 H165:402; (c) 庙底沟: H322; (d) 庙底沟: 2002H9:47

图 10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阳鸟飞翔纹

庙底沟类型太阳与鸟纹共生的现象,不但有如上写实风格,还有比较写意和抽象的风格,如图 11 所示。标本(A9h T68:02)左侧图案表现的是侧面

盘旋飞翔的两只神鸟,左上角的黑点为太阳纹,同一标本右侧图形表现的是两颗太阳纹或上下翻腾飞翔的两只阳鸟。标本(H10:131)右侧左下方彩绘条带纹部分残缺,其余部分与 A9h(T68:02)基本一致,用上下两个圆点表示太阳,重复表示强调;标本(H46:139)则用上下两只抽象的正面鸟纹代表两只太阳鸟,重复同样表示强调;标本(H1046:858)甚至还有上部太阳纹与下部正面飞翔鸟组合而成的图案。请注意在标本 A9h(T68:02)和(H10:131)中,左右两侧下各有一条从左向右上扬的双弧线,其上又有黑点太阳纹,结合图 10 来看,这条弧线很可能表现的是太阳运行的轨迹。

庙底沟类型正面、侧面和抽象鸟纹中出现的代表太阳圆点纹与代表金乌的鸟纹顺势转换,自由替代的现象,正是史前巫术-宗教社会万物有灵观念的生动写照,而纹饰中表现太阳运行的弧线轨迹恰好与初民神话思维中太阳鸟的旋转飞翔相互一致,构成明显的原始社会的集体心理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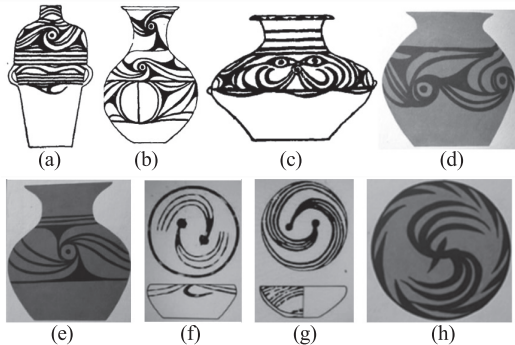
(a) 庙底沟: A9h T68:02; (b) 庙底沟: H10:131; (c) 庙底沟: H46:139; (d) 华县泉户村: H1046:858

图 11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抽象太阳鸟纹

图 12 所列的是西北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中的变体鸟纹。这些变体鸟纹大体上来自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经石岭下类型的中转,由东往西逐渐渗透,在马家窑文化马厂期最终抵达河西走廊全境。严文明先生指出:“甘肃地区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同陕西、山西和河南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属于一个整体。”“把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期的蛙纹和鸟纹联系起来看,很清楚地存在着

①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第 2 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59 年第 11 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2011 年;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庙底沟文化彩陶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朱乃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研究》,《南方文物》2016 年第 4 期。

因袭相承、依次演化的脉络。开始是写实的,生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都逐步走向图案化、格律化、规范化,而蛙、鸟两种母题并出这一点则是始终如一的。”^[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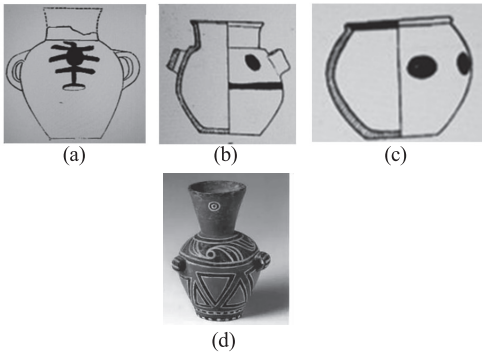


(a) 静宁威戎镇; (b) 甘肃; (c) 天水关子镇; (d) 天水师赵村; (e) 天水市寨子; (f) 兰州西坡; (g) 武山傅家门; (h) 东乡林家

图 12 马家窑文化变体双鸟纹

太阳与鸟共生的现象不但出现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中,并向西传播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成为其文化母题,而且还出现在中国境内东部地区和东南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之中,且出现时间总体上要早于上述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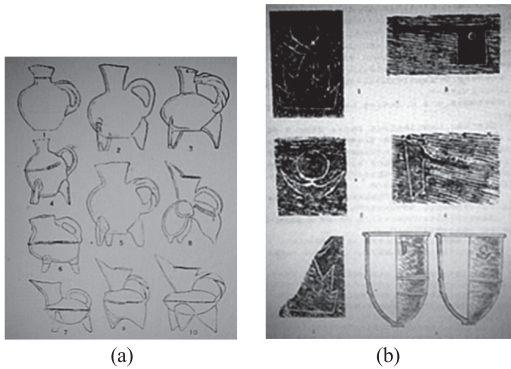
图 13 是大汶口墓葬遗址出土彩陶器上的变形鸟纹和圆点太阳纹,其中一件背壶上发现了“金乌纹”;在部分圆腹罐、背壶上有圆点纹,风格类似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圆点太阳纹。另有一件彩陶壶肩部的纹饰,此一纹饰当为双鸟纹,双鸟共用一首,同时隐喻太阳,鸟身变形夸张,呈展翅飞翔状,充分表现太阳的运动感和神秘感^①。



(a) 金乌纹,大汶口文化早期,公元前 4300 年左右;
(b) 圆点太阳纹,大汶口文化中期,公元前 3500 年左右;
(c) 圆点太阳纹,大汶口文化中期,公元前 3500 年左右;
(d) 彩陶双鸟纹,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公元前 2500 年左右。

图 13 大汶口文化鸟纹、太阳纹

图 14 为大汶口文化数量较多的实足和空足鸟形鬻陶器和“象形文字”,上述变形鸟纹图像、鸟型器和象形文字,均反映了东夷文化中太阳鸟崇拜的遗迹。尤其所谓“象形文字”,被很多文字学家释读为原始文字,更为大汶口文化太阳鸟崇拜习俗做了最好的说明^②。



(a) 鸟形鬻,大汶口文化早、中、晚期,公元前 4300—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其中 1. 为无足鬻,早期;2. 3. 4. 5. 6. 7. 为实足鬻,中期;8. 9. 10. 为空足鬻,晚期。); (b) 大汶口象形文字,大汶口文化晚期,公元前 2500 年左右。

图 14 大汶口文化鸟形鬻和象形文字

河姆渡文化中同样发现了众多的木、石、骨、象牙等质料的鸟形器,以及刻划其上的鸟纹纹饰,尤其是成双成对的鹰嘴大眼鸟纹饰与太阳纹的组合,更是其中的代表(图 15)。标本(T21(4):18)在象牙骨匕的正面刻划了一组连体鸟纹,鸟头相背,鹰嘴大眼,鸟背呈太阳光焰形,鸟眼和鸟身中皆有未钻透的圆窝,前者单圈纹内侧刻有一圈放射状短线,后者则无^③。标本(T226(3B):79)在象牙蝶(鸟)形器正面刻划了一组双鸟与太阳连体纹^④,图案正中的圆心外有五重同心圆,同心圆上半部刻象征烈日火焰的纹饰。两侧各刻一鹰嘴圆眼回首相顾的鸟形纹,鸟身以弦纹间以斜线纹组成的连弧纹图案组成,其上还各有一疑似象征太阳的小圆孔。黄厚明认为:“河姆渡人的太阳

①原报告解释为漩涡纹,恐误。见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 年。

②唐兰、于省吾、裘锡圭、王树明等人认为大汶口象形符号已经是原始文字,并对这些符号进行了释读。参见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 年,第 249—308 页。

③此一圆窝形纹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认定为“山背之形”,疑非,当为太阳光焰纹。

④此一纹饰有多种解释,其中尤以“双鸟朝凤”最为有名,疑非。观其形状并结合其文化语境,当为双鸟连体太阳纹,黄厚明说当从。详参黄厚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鸟形象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论文,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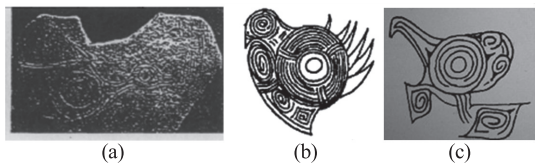
神和鸟神的观念已经初步形成”^[4]。



(a) 河姆渡:T21(4):18;(b) 河姆渡:T226(3B):79

图 15 河姆渡文化双鸟与太阳连体纹

河姆渡之后的崧泽—良渚文化中都有大量的鸟崇拜痕迹,鸟纹与太阳纹共生组合的传统在中国境内东南地区得以继承下来。良渚文化陶器上保留着鸟纹与太阳共生复合的纹饰。如图 16 标本 SO34 陶鬲腹部残片上刻有一只展翅的飞鸟,飞鸟的胸背部刻有一个象征太阳的红彩重圈纹;标本(M14:135)为良渚文化三叉形玉器之上的飞鸟重圈纹,鸟身内饰填满重圈纹、卷云纹、弧线纹、断直线纹等纹饰;标本(M2:1)为良渚文化玉冠形器上的飞鸟重圈纹,鸟身内饰重圈纹,外辅助小三角纹,鸟身后部饰半月纹,鸟双翼展开,内饰卷云纹。鸟脚下相连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旋涡纹象征鸟神的回环旋转和飞翔,形象地表现了太阳神鸟的运动形式。以上 3 例鸟身上的单圈纹和重圈纹都表现太阳,而太阳纹与鸟纹的结合,则充分彰显了良渚文化的太阳鸟神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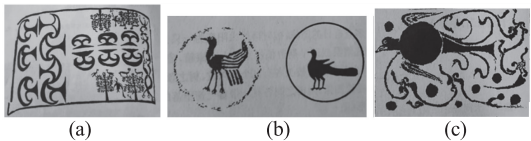


(a) 双桥:SO34;(b) 反山:M14:135;(c) 瑶山 M2:1

图 16 良渚文化鸟与太阳复合纹

中国境内中部、东部、东南部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太阳鸟崇拜神话。传说“日中有金乌,金乌背负太阳运行”,这一传说既与前述庙底沟类型侧面鸟纹相应,又跟上古神话典籍中的文字记载不谋而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在原始的神话观念看来,乌/金乌/黑乌等鸟即是太阳神的化身之一,太阳神亦是金乌,金乌和太阳在初民们所熟悉的宗教—巫术语境内可以顺势转换。《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北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至于禺谷。”郭璞注:“禺渊,日所入也;今作虞。”传说中又有“十日并出”和后羿射日的神话。《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后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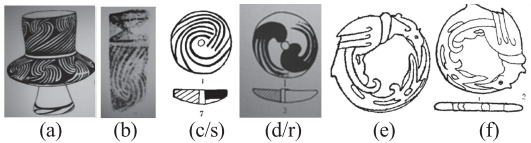
……上射十日……”这些神话传说故事,不但有史前的踪迹,而且在历史时代的图像叙事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如图 17 所示。若究其根本,则历史时代的这一神话母题始终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汶口—龙山文化、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中的太阳鸟图像叙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a) 漆器箱盖扶桑树与金乌:战国曾侯乙墓;(b) 汉画像石三足鸟;(c) 汉画像石太阳鸟

图 17 历史时代的“金乌”纹

此外,在石家河文彩绘陶纺轮上有一例红彩涂绘的“太极纹”(图 18 标本(AT1047a:17)),其形象颇类似鸟纹,我们前面说过,此一纹饰是解开石家河遗址群太极图纹来源的关键所在,该纹饰的尾部明显分岔,其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马家窑文化,东部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东南地区的河姆渡—崧泽—良渚文化中变形鸟纹的形象均有关联,却与通常所谓的八卦太极图有别。另在屈家岭文化彩绘陶残片上也发现了 2 例用抽象线条彩绘的双鸟纹饰,如图 18 标本(标本 F11:25 和标本 T54:3(5))所示,而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发现的陶纺轮上同样发现了 1 例纯粹使用线条彩绘的双鸟纹,如图 18 标本(T7⑤:13)所示。以上三例鸟纹的彩绘风格近似,都使用抽象的线条表现双鸟旋转的形象,可作为标本(AT1047a:17)的佐证。



(a) 浙川黄楸树:F11:25;(b) 京山屈家岭:T54:3(5);(c/s) 罗家柏岭 T7⑤:13;(d/r) 邓家湾:AT1047a:17;(e) 邓家湾:1956,石家河文化;(f) 罗家柏岭:T32③A:99,玉器

图 18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双鸟纹

另外,在罗家柏岭出土的盘凤玉环之上,还发现了首尾相连,似用鸟喙梳理尾羽的盘凤纹,似亦可作为旁证。当然,无可否认,这两类纹饰之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彩绘陶纺轮上的图像是两只头部相向,盘旋飞翔的双鸟,盘凤玉环则是一只头尾相向的鸟。或许在屈家岭文化中,尚保留着本地或者来自其他地域文化的具象鸟纹和旋纹,而到

了石家河文化时期,这些具象的鸟纹随着原始阴阳观念的产生,已经逐步过渡为抽象的太极纹图案,仅在个别涂绘,比如在玉制礼器这一类比较传统的工艺中还残存着早期的痕迹(图18)。

总之,我们认为:《邓家湾》考古报告指认为“太极纹”的石家河文化早期彩绘标本(AT1047a:17)实际上表现的是头部相向、尾部分岔、上下翻腾飞翔的两只鸟的形象,其寓意为太阳神鸟围绕太阳翻腾飞翔,这一形象与史前时期中国境内东部、东南部地区乃至江汉平原地区普遍流行的太阳鸟崇拜密切相关。这一飞鸟形象虽然是石家河文化早期众多太极纹中一个例外,但它却是解开石家河遗址群考古发现的众多太极纹寓意的关键所在,它是屈家岭文化中“鸟神”盘旋飞翔观念与

石家河文化原始“阴阳”观念之间的桥梁,呈现出原始“道文化”阴阳观念的最初形态。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等.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J]. 南方民族考古,1992(5).
[2]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重译本)[M]. 连树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石兴邦. 我国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古代文化中鸟类图像与鸟祖崇拜的有关问题[C]//田昌五,石兴邦.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4] 黄厚明.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文化中的鸟形象研究[D]. 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4.
[5] 严文明. 甘肃彩陶的源流[J]. 文物,1978(10).

On the Earliest “Tai Chi Pattern” i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Original “Yin and Yang” Concept

HUANG Yap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many earlier prehistoric cultural sites of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 of the Jiangnan Plain area, there exist a large number of ceramic spinning wheels, among which the painted ones account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n these painted spinning wheels, there are abundant painting patterns, such as stripe pattern, quarter line pattern, dot pattern, spiral pattern of arc, fan-shaped pattern, windmill pattern, concentric pattern and “Tai Chi pattern”. “Tai Chi pattern”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Tai Chi pattern” found in Shijiahe ruins group should be the earliest prehistoric Tai Chi ornamentation in China’s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is pattern should be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yin and yang concept of Shijiahe ancestors. The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ai Chi pattern” have an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for us to make clear the initial state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original “yin and yang” concept, and probe into the ins and outs of Chinese Taoism culture.

Key words: Shijiahe ruins group; Tai Chi pattern; suspected bird pattern and bird worship phenomenon; original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责任编辑 陇 右)